

# 关于民族考古学的思考

张锦华

(黔西南州民族文化中心,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 文章梳理了在考古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内外学者对民族考古学的不同认识, 对其主要内涵、类比材料的选择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 得出了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拓宽视野的方法, 可以为考古学解释提供参考的结论。

**关键词:** 民族考古学; 主要内涵; 材料选择; 研究方法

DOI: 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10.043

## 1 国内外民族考古学发展综述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源自西方, 从其发展历史来看, 18世纪初期甚至是16世纪, 已经有运用民族志判断考古材料用途的先例了, 这个时候虽还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考古学”, 但可视为其发展的原始阶段。19世纪后期, 在摩根、泰勒和斯宾塞等人“古典进化论”即“单线进化论”——“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 经验相同, 进步相同”的理论指导下, 民族志对比已经被广泛用于考古材料解释<sup>①</sup>。19世纪末20世纪初, 美国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兴起, 他们看到了“古典进化论”的缺陷, 强调要了解一定地区内民族与文化的历史, 比较方法被历史方法所代替, 此即后来的“直接历史比较法”。该阶段北美民族学的田野工作非常活跃, 这与北美大陆相对封闭、文化有较强的连续性有很大关系。20世纪40年代, 斯图尔德正式命名了“直接历史比较法”<sup>②</sup>。20世纪50年代, 仍有部分学者如霍克斯、史密斯、拉明等, 他们认为古今有别, 这样的民族志类比法是无效的。同时, 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民族学学者收集的民族志资料由于缺少考古学家所需的物质表现的内容, 不能很好地解释考古材料, 因此, 强调从“考古学角度出发, 由考古学者从事民族学田野工作获得民族志材料”的“考古民族志”思想得到了很大发展。

20世纪60年代, 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兴起, 一些学者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考古学看作新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新考古学以

新进化论即“多线进化论”为理论基础, 强调将文化视作系统, 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特征是相互关联的; 提倡“文化生态学”, 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 即文化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 技术受到环境影响; 提倡研究文化系统的进化过程<sup>③</sup>。学者们认为, 作为新考古学分支的民族考古学, 从事调查的目的是解决考古学问题, 调查要着眼于物质文化中不可直接观察的人类行为与意识, 而不仅仅关心器物的名称与功能, 将“是什么”“何时”“何地”的问题转为“如何”“为什么”。同时, 新考古学下的民族考古学不再关注具体事实层面的映射关系, 而是建立中程假设和校验假设, 即通过研究现代民族的行为、行为对物质文化的塑造过程, 观察不同行为会对物质文化造成哪些可以观察到的痕迹, 然后观察考古材料中有没有留下类似痕迹, 通过实验考古等手段验证这些痕迹是不是由类似行为产生的, 验证假说是否科学。

20世纪80年代, 认识到新考古学对适应技术的过度关注, 对跨文化人类学比较历史背景的忽视以及把考古学作为实证主义的严格定义,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兴起。“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更加强调“意义”和“象征性”, 主张技术的意义应该取决于特定情况下人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注重对背景的关联; 强调物质文化是积极、能动的, 而不仅仅是环境适应的工具, 人们可以运用和控制文化来影响社会变化; 强调“过程考古学”的假说、演绎实证主义立场不能满足研究的目的<sup>④</sup>。因为过程考古学主张用可观察的材料来验证假说, 但考古学大多时候都是在讨论不能观

**【作者简介】** 张锦华, 女, 山东淄博人, 硕士, 初级职称, 研究方向: 商周考古。

察到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用这样的“不能观察”去检验假说，可靠性遭到质疑。因此，“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又名“阐释考古学”，主张社会利益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构建过去，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需要通过吸收客观材料来解决，因为人们看到的客观材料是可以变化的。阐释涉及从材料到理论的反复修正与充实，要将越来越多的信息嵌入到一个整体观点中，形成“最为契合”的阐释。

自“民族考古学”概念从西方引入我国后，不同学者对其定义有着不同认识，对其内涵的理解也是不断发展的。

较早的容观琼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就是利用民族学资料、考古材料以及历史文献所含信息去追溯人类创造和发展的历史<sup>⑤</sup>，从研究目的来看，笔者认为容先生的观点似乎应该归入“历史考古”的范畴。汪宁生先生认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认为其就是将收集到的民族志材料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以解决考古学问题的学科。他主张“礼失而求诸野”是我国“民族考古学”的传统，这其实与“古典进化论”观点相似；并且汪先生认为类比材料只能从处于前工业社会阶段的民族中获取<sup>⑥</sup>。曹兵武先生认同俞伟超先生，认为将“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考古学”实为“民族区域考古”“族别考古”的意思，应该译为“民族学的考古学”，它是一种赋予考古学新思维模式和研究手段、使其能够对古代文化理解达到新高度的研究方法<sup>⑦</sup>。韩建业先生认为考古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才是适应考古需要产生的，之前汪先生等人所做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志材料的类比研究多是些盲目类比，“程式化的解释”。他认为民族考古学需要做的其实是“考古民族志”的工作，不应该包含对考古材料的具体解释，考古材料本就充满多种可能性，当用类比假说套用考古材料时很有可能造成“假说”先入为主的情况。因此，韩先生主张解释考古材料应从实际出发，他更倾向于称“民族考古学”为“考古民族学”<sup>⑧</sup>。黄建秋先生的“古今事物”九种关系模式<sup>⑨</sup>，仍是停留在功能和定名层面，这样的类比似乎多为盲目类比，缺乏科学性，但他认为民族考古学应该关注到文化变迁过程，也算是接受了新考古学的影响。郭立新先生融合古典进化论和现代进化论的理论成果，主张民族考古学应该包括考古民族志和应用民族考古两个部分，两者相辅相成<sup>⑩</sup>。许永杰先生认为民族考

古学是一种利用民族学资料，借助对比手段阐释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的方法<sup>⑪</sup>，他列举了汪宁生先生、李仰松先生等的研究文章来界定民族考古学的范围，认为只要使用了民族志资料解释考古遗存，就可以被视作使用了“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持怀疑态度，因为20世纪50年代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考古学问题，这种类比的科学性实在难以把握。徐坚先生接受了新考古学观点的影响，认为以往的“民族考古学”是在“前新考古学”范式下，民族志材料与考古材料的类比多是出于定名以及功能、意义判断的用途，即新考古学的“初级通则”层面，但是考古学的“初级通则”与“考古学情境”密切相关，因此摆脱了考古学情境的跨时间、跨空间和跨文化的类比是没有意义的。而新考古学下的民族考古学，从考古学问题出发进行民族志调查，以行为研究为诉求，建立中程假设和检验假设。徐先生还认为，既然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其目的在于构建中程模式和检验假设，那么与“民族”并没有关系，可以纳入人类学范畴的文化类型显著增加，工业社会个案分析没有理由排除在调查之外，这样的“民族考古学”称为“人类考古学”更为恰当<sup>⑫</sup>。

## 2 民族考古学定义、材料选择及研究方法

关于“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笔者比较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之前“所谓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多是民族志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样的类比多是些盲目类比，不能说某民族志中有与某些考古遗存或遗迹相关的类似记载，就能在不了解两者文化背景的前提下硬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而有了考古民族志之后，才是立足于考古学立场进行的研究。这种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对现存民族的行为进行系统考察的方法为解释考古材料提供了一种模式。但是，新考古学下的民族考古学，虽指出跨时间、跨空间、跨文化的“前新考古学”类比是无效的，但它本身在进行比较时也会忽略历史背景，忽略物质文化的积极性，这与它所批判的“前新考古学范式”下民族考古学仅停留在“初级通则”方面，忽略了“考古学情境”的情况又是相似的。综上，笔者更倾向于民族考古学是为考古材料的解释提供一种假说模式，至于这种模式是否正确，还是应从考古材料的实际情况出发，多利用科

学手段对其进行分析,若能验证假说的正确性,当然最好,但如果不能验证,也不可以将假说硬扣在考古材料上。

关于“民族考古学”类比材料的选择原则,许多学者认为根据均变说,要选择与考古遗存有直接关系的民族志材料或时间上相近、空间上相邻的;根据发展阶段性原理,要选择与考古对象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另外,还要选择生态环境相似的<sup>③</sup>。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在历史渊源、社会发展阶段、环境背景相似的前提下,人们的物质和意识是可能存在相似性的,这种类比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较高,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徐坚先生的观点很新颖,他认为作为新考古学分支的民族考古学,工业社会的案例也可纳入人类比范畴。根据常规观点,这种做法似乎是对历史背景的忽略,但根据《垃圾之歌》对图森市垃圾的分析,人们确实从中得到了复原古代社会和古代认知的有益思路<sup>④</sup>。这样看来,现代工业社会的案例或许也可以加入到民族考古学的分析材料中,但这种分析得到的可能不是某种具体的人类行为模式,而更倾向于一种启示,即物质文化的形成与人类认知之间是有一定出入的,现代人如此,古人亦如此,尤其是学者所处理的考古材料,除了有意埋藏的墓葬和窖穴之外,实际上多数为古代垃圾,因此,用物质文化逆推古代人类认知是过于简单化的。至于具体的材料选择,笔者认为正式的民族志资料、早期游记、博物馆藏品、实验报告以及考古民族志都可作为研究材料,但无疑考古民族志应该是最重要的,其余的多是起到补充作用。此外,还应注意考古民族志对社会还原的真实程度。在人类学调查中存在被调查人群刻意“伪装”成调查者期望观察到的状态的例子,有两种情况:一是被调查者“伪装”出的状态是他们在受到外界影响之前的真实状态,那么这种“伪装”之后的材料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二是如果他们“伪装”的是仅凭想象制造的状态,那么材料的可信度便大大降低了。

关于“民族考古学”“演绎—假说”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在学者倡导的“观察与分析”步骤上,有两点需要格外注意:第一是通过考古民族志分析所得的“实物与含义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解读直接影响到所作假说的可靠性。比如,如果我们在考古民族志调查中观察到工具“铲子”是与“狩猎”这种行为相关的,当在考古材料中观察到铲子时,若用考古

民族志建立的模式作出假说,使用铲子的人群应该是以“狩猎”为生,这与“铲子”本身所代表的是“农耕文明”的实际情况就有了根本性出入。如果根据其他考古材料可以纠正这种错误假说,那是值得庆幸的;如若不能,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就走向了一种错误方向。第二点是应该注意考古遗存的自身特点,这对科学考古发掘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我们必须注意考古材料自身及其周围环境中的一切“痕迹”。第二个步骤“类比”,首先必须了解类比双方的共同特性,明确需要解释的问题,选择恰当的类比点。“通过类比建立起来的两个文化共同体间的相关性联系”也需认真把握,否则,这种类比很有可能成为盲目类比。第三个步骤是“类推即产生假说”,在进行这一步骤时,不管是对器物功能、文化模式、行为过程还是社会组织作出假说,都必须坚持从考古材料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民族志作为补充,绝不可以让民族志确立的模式先入为主,使考古材料“削足适履”。最后,在假说验证环节,应认真思考假说之下的考古遗存可能会有的宏观特征和微观面貌,再去进行实地观察,得出的实际结论可能验证假说,也可能推翻假说,但即使是前者,也不能做出过于绝对化的判断,只能说民族志为考古材料的解释提供了一种较为正确的模式,而通过科技手段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才是更为精准的。

### 3 民族考古学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对于考古学要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而言,民族考古学的优势在于能够对现存的各种行为与行为产生的物质进行直接观察。考古学家只有了解了行为是怎样过渡到遗存的,才能从遗存去复原行为。通过对民族考古学案例的观察研究,可以启示考古学家在阐释材料时注意多种可能性,尽量避免想当然的直接解释。

民族考古学启示考古学家要关注器物的象征意义。就像洛科普人对矛的类型的选择,不仅看其功能,也是一种历史环境变迁的动态产物。矛在洛科普被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当地人声称可以通过男子的矛来识别其社会角色,虽然这种识别还需要更多信息来提高其准确性,但这确实启示我们要关注器物的象征意义。在考古学遗存中,研究者要关注那些可能具有特殊含义、代表使用者身份地位的特殊人工制品,它

们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与权力挂钩；也要关注在某一地域内的独有器物，如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大汶口文化的獠牙勾形器、良渚文化的玉琮、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等，小范围地域内的独有器物可能对应着某一群人。

民族考古学更加强调对于操作链的观察，这启示考古学家不能仅将人工制品视为静态遗物，而应把它们作为一系列动态技术操作的综合结果，只是描述技术现象距离考古学的最终目标还相当遥远，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原料物理化学性质、个人决策等多个角度综合解释这些选择，是更值得深究的问题<sup>⑩</sup>。尽管目前操作链理论因为过于理论化、抽象化、概念模糊而受到一些学者批判，考古学家还是应该加强其在陶器的民族考古学等领域的应用，使人工制品的研究跳出类型学的局限，多考虑风格与功能、实用与象征原因、技术与文化因素等等，在分析文化选择可能性的基础上去了解古代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文化。

民族考古学还启示考古学家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阐释考古记录中的动物及其他与生计有关的证据。过去的人们并不总是采用一种生计活动，尤其是在一些农业边缘地区，受自然条件影响，很有可能存在几种生计活动并存或交替进行的情况。因此，同一族群同一时期可能留下两种不同形态的遗物或遗迹。并且，由于许多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会在聚落建筑范围之外的地方进行，考古学家还应尽可能地关注遗址中的“远地点”区域，这对判断生计手段、聚落模式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 4 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拓宽视野的研究方法，可以为考古学解释提供参考。但是，一切分析都应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实际情况，避免陷入假说验证的陷阱。■

### 注释

①②丹尼尔·史泰尔，谢仲礼.民族考古学——关于方法及其运用的讨论[M]//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③④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关键概念[M].陈胜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⑤容观琼.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94-99，107.

⑥汪宁生.论民族考古学[J].社会科学战线，1987（2）：315-320.

⑦曹兵武.谈“ethnoarchaeology”的译法及内涵[J].东南文化，1991（5）：236-238.

⑧韩建业.什么是“民族考古学”[J].东南文化，1993（2）：35-43.

⑨黄建秋.试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J].东南文化，1988（5）：174-177.

⑩⑪郭立新.民族考古学三题——关于名实问题、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探讨[J].南方文物，1997（4）：24-30.

⑫许永杰.民族考古学是什么[J].四川文物，2005（2）：88-93.

⑬徐坚.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J].江汉考古，2009（4）：49-55.

⑭威廉·拉什杰，库伦·默菲.垃圾之歌[M].周文萍，连惠幸，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⑮郭梦.操作链理论与陶器制作技术研究[J].考古，2013（4）：96-104.

### 参考文献

[1]容观琼.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94-99，107.

[2]汪宁生.论民族考古学[J].社会科学战线，1987（2）：315-320.

[3]黄建秋.试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J].东南文化，1988（5）：174-177.

[4]丹尼尔·史泰尔，谢仲礼.民族考古学——关于方法及其运用的讨论[M]//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5]曹兵武.谈“ethnoarchaeology”的译法及内涵[J].东南文化，1991（5）：236-238.

[6]韩建业.什么是“民族考古学”[J].东南文化，1993（2）：35-43.

[7]威廉·拉什杰，库伦·默菲.垃圾之歌[M].周文萍，连惠幸，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郭立新.民族考古学三题——关于名实问题、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探讨[J].南方文物，1997（4）：24-30.

[9]许永杰.民族考古学是什么[J].四川文物，2005（2）：88-93.

[10]徐坚.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J].江汉考古，2009（4）：49-55.

[11]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关键概念[M].陈胜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2]郭梦.操作链理论与陶器制作技术研究[J].考古，2013（4）：96-104.